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第七卷·二〇〇六

Volume VII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7卷/常建华主编.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10

ISBN 7-80696-350-2

I. 中... II. 常... III. 史评—中国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9990 号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7卷)

常建华/主编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天津蓟州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8 字数 640000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696-350-2

定 价: 65.00 元

编辑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常建华	陈振江	杜家骥	冯尔康	江 沛	李喜所
李治安	刘泽华	南炳文	王利华	王先明	魏宏运
许 檀	余新忠	张分田	张国刚	张 思	朱凤瀚

编辑部

常建华	胡 滨	王利华	王先明
许 檀	余新忠	张分田	张 思

主 编：常建华

英文译审：张伟伟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协办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七卷·二〇〇六

目 录

特稿

中国善会善堂史

- 从“善举”到“慈善事业”的发展…………… [日]夫马进(1)
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 [日]夫马进(7)

社会史史料学

乾嘉之际小业主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

- 兼述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的价值…………… 冯尔康(13)

明清时期孝行的文本解读

- 以江南方志记载为中心…………… 余新忠(33)

- 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 常建华(61)

- 满族家谱对女性的记载及其社会史史料价值…………… 杜家骥(75)

思想观念与社会

“殷人尚右”观念的再考察

- 以甲骨文字形和考古资料为视角…………… 朱彦民(85)

秦朝统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因素

- 以全社会普遍意识为视角…………… 张分田(99)

- 论《太平经》的民本思想…………… 张 鸿(113)

- “五四”新文化时期两性伦理观念的嬗变…………… 关 威(121)

生态与社会

“山兽之君”、虎患与道德教化

- 侧重于明清南方地区…………… 黄志繁(143)

- 坟茔义冢:明清江南的民众生活与环境保护…………… 冯贤亮(161)

城市经济发展与景观变迁

- 以明清陕西三原为例…………… 张 萍(185)

河道变动与界的表达

- 以清代至民国的山、陕滩案为中心…………… 胡英泽(199)

- 略论国家行为与西北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王玉茹 杨红伟(221)

法制与社会

清代寺庙产业纠纷中的国家与社会

- 以档案与判牍资料为例 吴 欣(235)
- 试论清至民国宁化的民间经济纠纷及其解决 王日根 陈 瑶(249)

身体与历史记忆

身体的争夺与展示

- 近世中国发式变迁中的权力斗争 张德安(265)

国家与基层社会

清代北方官办乡约组织形式述论 段自成(291)

教育、族群与地域社会

- 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初考 罗艳春(307)

由涣散到整合:国家、地方及宗族之内

- 以黄冈县郭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为例 徐 斌(321)

冲突与融合: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青苗会组织 王洪兵(337)

社会结构

科举家族女性的社会角色 李伟中 王先明(361)

晚清湘系势力的崛起与社会结构变动说略 董丛林(373)

移民与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1860 - 1911) 白宏钟(383)

书评

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

- 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孙卫国(399)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韩明士:《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 周 鑫(411)

《内藤湖南の世界》简介 胡宝华(421)

井上彻、远藤隆俊编《中国宋—明宗族の研究》 常建华(427)

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罗艳春(431)

稿件书写格式 (437)

编后语 (438)

CONTENTS

Special Contributions

- A History of Chines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From Benevolent Action to Charitable Enterprise Fuma Sisimu(1)
- Korean Yan Xing Shi (Korean envoy to China) and Korean Tong Xin Shi (Korean envoy to Japan) in the Qing Dynasty Fuma Sisimu(7)

Historical Data of Social History

-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Social Life of Petty Proprietors in the Reigns of the Emperor Qianglong and the Emperor Jiaqing: Value of Criminal Files as Historical Data in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Jiaqing in Addition FENG Erkang(13)
- Filial Behavio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 Textual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Local Records in Jiangnan YU Xinzhong(33)
- Value of Chinese Local Chronicles as Social History Data CHANG Jianhua(61)
- Accounts of Women in Manchu Genealogy: Value of Social History Data DU Jiaji(75)

Ideas and Society

- Argument of “*Yin Ren Shang You*” (people in the Yin Dynasty attach more importance on right side) Reexamined on 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Carved on Tortoise Shells or Animal Bones an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ZHU Yanmin(85)
- Elements of *Minben*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a nation) in the Ruling Thought in the Qin Dynasty from a Perspective of General Social Consciousness ZHANG Fentian(99)
- On the Concept of *Minben*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a nation) in *Tia Ping Jing* (a book of peace) ZHANG Hong(113)
- Change of Sexual Ethics in the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GUAN Wei(121)

Ecology and Society

- “King of Beast”, Tiger Calamity and Ethics in the South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ANG Zhifan(143)

- Grave and Free Graveyard: Lif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Jiangn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ENG Xianliang(161)
-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ndscape Change: A Case
Study of Sanyu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Ping(185)
- Change of River Course and Definition of Boundary: A Case Study of Boundary
Disputes over Beach Land between Shanxi Province and Shaanxi
Province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HU Yingze(199)
- State Act and Historical Change of Ecosystem
in Northwest China WANG Yuru, YANG Hongwei(221)

Legality and Society

- Functions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Disputes over Temple Property in th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based on Files and Judgments WU Xin(235)
- Civil Economic Disputes and their Settlements in Ninghua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Rigen, CHEN Yao(249)

Body and Historical Memory

- Political Struggle over Body: Changing of Hairstyle in Modern China ZHANG De'an(265)

State and Local Society

- On Organization Patterns of Official *Xiangyue* (a village administration)
in North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DUAN Zicheng(291)
- Education, Ethnical Group and Local Society: Studies of on the Academies of Wanzai, Jiangxi,
in the Middle Qing Dynasty LUO Yanchun(307)
- Lineage Integration: State, Local Influences and Clan: A Case Study
of the Guos in Huanggang County XU Bin(321)
- Conflict and Coexistence: Government and *Qingmiaoahui* (a village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 to protect unripe grains)
in North China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Hongbing(337)

Social Structure

- Social Roles of the Female in Kejujiazuo (a family that has
people passed in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 LI Weizhong, WANG Xianming(361)
- Rise of the Hunan Faction and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ONG Conglin(373)
- Migrants and Moderniz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1860 - 1911 BAI Hongzhong(383)

中国善会善堂史

——从“善举”到“慈善事业”的发展

夫马进

(日本国京都大学文学部)

今天,我想讲一些有关中国善会善堂史中近代以来的事情。主要的话题是清末、民国初年之际,曾经使用的“善举”概念,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关于善会善堂大体上的历史,我写了《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舍 1997 年),其后经伍跃、杨文信、张学锋将其翻译成中文,2005 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因此,今天的话题就不涉及该书已陈述过的内容了。

拙著的中文版发行后,听说在国际互联网商务印书馆的网页上刊登了相关的介绍与出版广告,后来当我在电脑上看到这些内容时,确实吃了一惊。因为在拙著的广告中,说我“借鉴了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近代公共性的概念”。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在中文版绪言中曾明确写道:很早以前读过哈贝马斯的著作,不过我觉得,如果在研究中国前近代社会中,使用这些来自西洋历史的“公共领域”和“市民公共性”的概念,最终无疑会像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方法一样,走入一条死胡同。实际上,我在拙著中除了批判美国学者之外,对“公共领域”以及“近代的公共性”的概念一概没有论及。商务印书馆的宣传广告与我的本意是完全不相干的。但是,我想这个广告也许是现在中国历史研究动向的一种表现。关于哈贝马斯的这些概念,中国在日本之前,即 1992 年以前,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就已经开始使用。在专著方面有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这是一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从正面探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概念的最早的作品之一。此后,在中国,涉及哈贝马斯及上述概念的论考相继发表了许多。目前,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进展如何,我希望能得到在座各位先生的明示。

我在 1980 年前后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曾设想“明末出现的善会善堂,经过三百年后,成为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基础”。这当然与哈贝马斯的“近代市民社会”的概念有一定关系。但是,正如拙著介绍的那样:1912 年即辛亥革命的次年,在用英文出版的朱友渔《中国慈善博爱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中,Public(公共的)一词,作为关键词被使用。朱友渔是早哈贝马斯近百年的历史人物,他对在此之前的中国史以什么作为基础而能够形成“民主主义”“市民社会”进行了考察。不论我们是否使用哈贝马斯提出的概念,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词“Public”在约一百年之间大概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的。

我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不是根据哈贝马斯的概念而出现的,也不是想在中国史研究过程中对它进行验证的东西,而是在 1970 年到 1980 年间在日本国内兴起的“乡绅研究”中

出现的。当时,日本国内的“乡绅研究”普遍认为清末、民国初期的土豪劣绅源自明末。对此,我认为那些被称为“地方公议”的府州县一级的公议,在明末时期常常由地方上的有识之士提倡并实施,这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生员论”的基础,也是清末上海兴起的地方自治的原始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的研究与朱友渔所关心的问题极为相似。因此,也有与哈贝马斯的“市民的公共性”观念相近的地方。

可是,研究的结果表明,从明末到清末期间,事实上在善会、善堂事业广泛开展的过程中,国家的影响也在增加。我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社会与国家的混淆”。简单地说,善会善堂以它原有的形式是不能成为近代地方自治的前身的。可以说上海的事例只属于少数的例外。但是,虽说是例外,在上海有个叫做同仁辅元堂的善堂,与近代地方自治机关的总工程师局有极为相似的地方。《民国上海县续志》所云“同仁辅元堂实为地方自治之起点”,即是一个明确的证明。而且,我注意到为了公共事业而组建新上海总工程师局之际,采用了旧善会善堂组织形成时完全相同的方式,这两个组织机构还同样出版了《征信录》这样的事业会计报告书,并将其公之于众。这就是说,在评价善会这样新的结社方式出现于明末的时候,着眼点不是将它视为与国家对抗而出现的新事物,而是认为这种新的结社方式始于明末,地方公益事业也借此得到了新的发展。

目前,正如前面提到的朱英先生那样,中国的近代史学界,把清末出现的 association 叫做“新式社团”等,一般通行的观点认为它与以前的旧式社团是不同的。但是,我认为如果善会善堂是旧式社团的话,那么,它和新式社团之间有哪些异同?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展开充分的探讨。

在此,我想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清末出现的“慈善事业”这一概念,与在此之前的“善举”概念之间,存在哪些方面的不同之处?在二者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认为从“善举”到“慈善事业”的发展,实际上意味着善会善堂“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

在中国史上开始使用“慈善事业”的词汇是在清末光绪年间。例如在1904年的《东方杂志》第1卷第11号题为“论慈善事业中外之不同”的社论中就使用了这一词汇。这是转载《时报》的记事。像这样有名的报刊上,用这样的题目刊登论考文章,显示出当时“慈善事业”已经是一个国民皆知的词汇了。

这篇社论,顾名思义主要论述的只是中国与欧洲、美国慈善事业的异同点。这里,作为“中国的慈善事业”所记录下来的内容,如果是发生在光绪二十年前后,即1894年左右的话,就会被称作“善举”。事实上,1895年3月4号的《申报》刊登了题为“论行善举宜取法于泰西”的文章,该报在1897年又发表了题为“效法泰西以行善举议”的论文。这两篇文章都在题目上使用了“善举”一词。这两篇文章与前揭《时报》《东方杂志》一样,将中国的“善举”和欧洲、美国的“善举”进行了对比,认为欧洲、美国的“善举”更优秀,确切地主张“善举近代化”。与此相类似的内容,在光绪二十年从题目为“善举”置换为“慈善事业”,这一动向透露出时代发生变化的信息。

在《东方杂志》的文章中,提出了到此为止中国实行的旧“慈善事业”即“善举”是一种次等的,而欧洲、美国的“慈善事业”是优等的观点。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从事救济活动者的动机与精神是相互不同的;二是救济的方法与制度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在从事救济活动者的动机与精神方面,中国的“善举”是一种考虑祸福的行为,其动机来源于为善者必有善报的

观念。而欧洲与美国的新“慈善事业”，是依据人类的一种自然之情来实现的，即用博爱的精神来完成慈善事业。

上述第二个论点的主张是救济的制度与方法。在欧洲、美国的“慈善事业”其着眼点在于消灭导致人类贫困的原因，在必要的救济中给予职业和教育。所谓给予职业和教育的行为，简单地说就是进行“职业教育”。在这个主张提出之前，1904年《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刊登了题为“慈善教育说”的文章。文章主张为了防止乞食的发生，应该建立工艺局和工艺厂，实施职业教育。这里把职业教育作为“慈善教育”的表述方法，可以看作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

当然，“慈善”的语汇，在中国史上很早就有了。但是地方自治的“自治”这一词汇，与古典中的自治一词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的不同。与此相同，伴随新的意义的产生，“慈善事业”中的“善举”也具有了新的意义与新的理念。

“慈善”与“善举”关联在一起使用，也是光绪年间的事情。限于管见，“慈善”是在红十字会的活动中，从日本传到中国的词汇。红十字会去中国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大约在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到日俄战争结束（1905年）期间。最初，红十字会的活动是被表现为一个“善举”的行为。这个时期，“慈善”或是“慈善事业”的词汇，伴随着红十字会的活动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的行为，与“博爱”的词汇一样，带着理想主义的印象再次传入中国。

在稍晚一些时候，虽然能够感觉到理想主义的色彩已经在退色，但江苏南通出身的实业家张謇却将《东方杂志》的“论慈善事业中外之不同”、“慈善教育说”等观念付诸实践，或者至少在他的著作中给人以这样的感觉。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在他的著作中“慈善”“慈善事业”等已经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词汇在使用。张謇认为，“慈善”应该在地方自治实施政策中，排在实业和教育之后的第三个位置。关于实业是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开始实施的，教育事业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慈善事业则是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开始启动的。张謇主张“慈善”事业的具体措施包括：设置初等小学、小手工厂、具有工作场所的养老院和残疾人院，以及盲哑学校、贫民工厂、妇女工厂等，它们有实业与教育的联动关系（《张季子九录》自治录·感言之设计）。关于兴办慈善事业的动机，张謇说“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张季子九录》慈善录·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说，1922年）。他认为助人不是为了求果报和虚名，而为了使自己心情愉快。他还说：“王政不得行，于是慈善家言补之。……道又先励富，使人富而后仁义附焉。”（《南通养老院记》1912年）即自己首先“励富”，然后用其财力从事更多的慈善活动。在张謇看来，作为资本家所拥有的财富，应该要作用于社会的正义事业方面，这一点是很必要的。他的看法是一种极其乐观的理想，它与不久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并无一致。可是，这种乐观主义的局面没有持续多久，原因有二：一是十年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并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慈善事业的动机。二是不久国民政府推出了一项超越慈善事业的“社会事业”政策。

清末，给予“善举”决定的影响的是，江苏无锡的余治和他的著作《得一录》。这部著作于1869年（同治八年）在苏州首先刊出。此后，在中国各地有过几次再版，于是在社会上广泛地流传起来。这本书是在同治年间出版的，所以其中“慈善事业”之语还没有出现过。在这部书的余治的自跋中提出“古今各种善举章程”是为了实行善举而制定的规约。这是了解当时如何考虑“善举”的最佳史料。其中，从拯救因贫困倒在路上之人的扶颠局、抚养被遗弃儿

童的育婴堂、收容寡妇的清节堂、救济遇到水灾的救生局、为贫困孩子实行初等教育的义学等以人为对象的设施,到如何“抢救”写有文字纸的惜字会、挽救动物的放生会等,介绍了各种善会、善堂的规约。此后,“善举”和“慈善事业”开始混用在一起,但是两者的救济对象具有明显的不同。“为善应报”的思想表现得极为强烈。

经元善(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和郑观应(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1922年,民国十一年),他们都是受余治影响很大的人物。郑观应的思想在他早期著作中,表现出鲜明的“为善应报”思想。余治为郑观应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版的著作《救时揭要》写过序文,“为善应报”的思想在这部书中表现得十分强烈。但是,其中“拟设义院收无赖丐人,使自食其力论”的主张,明显是受到欧洲“慈善事业”的影响。这里,郑观应主张设置被称为“义院”的栖流局即流民收容所,并在义院教给这些流民耕作与织布。通过这些举措让他们自食其力,保全性命,社会也因此得到安定,边境得以开拓,并能增加国家的税收。此外,郑观应“亦复乞丐食街前者则议罚,以儆其贫”的主张,恐怕也是受到英国救贫法(Poor law)的影响。

郑观应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出版的《盛世危言》收录的题为“善举”的议论中,一面主张多设立善堂,“所有无告穷民,各教以一工一艺”,在这些收养设施中进行职业训练,使其开垦荒地增加国家税收;一方面他还介绍了欧洲成功经营疗养院、育婴院、义学堂等方面的经验。经过对比,他批判了中国各种善举中存在的“大抵经理不善,款项不充,致各省穷民仍多无所归者”的问题。提出应该在善堂设置“劝工厂”。

与郑观应同样,经元善也接受了余治的很大影响,他的为善应报观念也很执著。他认为“善恶报应,一定之理”(《经元善集》“急劝四省赈捐启”,1878年)。他在晚年1898年写下的《元济堂求雨纪事》中陈述了“感应之机,捷于影响”,可以看出经元善是一位信奉行善可以直接得到好报应的人物。

经元善在上述时期于上海开创了中国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中国女学堂),同时在其家乡的浙江上虞县和余姚县建立了农工学堂。经元善创办中国女学堂是一件非常有名的事件,这里想指出的是,经元善创建学校受到了郑观应和梁启超二人的很大影响,他本人将创建学校的行为称为“善举”,他还主张应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对女性也要教给工艺,实施职业教育。

此外,同时期在上虞县、余姚县建立的农工学堂,确实是一所为了实业教育的学校。他在提倡建立这类学校之际,陈述了这样的观点:“为善之事,当以贸易之法行之。贸易须顾资本,善举亦然。应为之善事甚多,而资款有限,不得不于行善中,求生财惜费之法,则创设工艺院是矣。”(“拟办余上两邑农工学堂启”,1898年)即把职业学校的生产收益,再回归到资本上来,使善举与实业一起发展。经元善不仅在工艺院如此经营,其他方面的善举也运用了这种方式。在育婴堂及恤嫠院都设有小工艺所,使其从事一定的工作。经元善把创建近代式学校称之为“善举”,虽然在“善举”中融入了新的教育成分,但却毫无矛盾之感觉。

郑观应和经元善,他们使用的“善举”范畴、词汇,后来称之为“慈善事业”。对他们来说,近代实施的政策没有特别的分歧,故均称其为“善举”。那么,“善举”和“慈善实业”二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正确地说“慈善事业”重视的是教育和职业训练。这一点在旧的“善举”中是看不到的,

这是从“善举”到“慈善事业”的变化中最能表现其特征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慈善事业”在产业革命的前夜发生的一些动向。可是,前面介绍的《东方杂志》“论慈善事业中外之不同”一文中提到的中国和欧洲、美国之间有两点不同,那么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是动机与思想的问题。诚如以上所述,余治和郑观应、经元善的动机在于为善应报的思想。把它看作是“善举”的主要动机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实施“善举”,绝不仅仅是这些具有为善应报思想的人。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中国最初的善会,即兴办同善会的杨东明、高攀龙、陈龙正等人,是根据万物一体的思想实施善举的,他们注重“生生”的感觉。按照万物一体说,高攀龙认为“凡吾为德于人,非其人之报也”,“吾之为善,如渴而饮,饥而食。饮食亦望报耶?”这样的言论表现出的正是新“慈善事业”的动机。张謇在其言论中屡次言及孟子的“恻隐之心”。在这一点上,“善举”和“慈善事业”之间绝不存在很大的区别。

以下是组织与制度的问题。在已经介绍的郑观应《盛世危言》收录的“善举”条中,郑观应批判中国“善举”是一种劣等的东西。可是他一边说“经理不善”,一边又作为改善的办法提到:“……遴委本地公正廉勤之绅士,实心经理,酌定章程,章程仿善堂,岁刻征信录。”(《盛世危言》“善举”)这是过去在善堂、善举方面经常说到的一种管理方法。而且,比什么都重要的是,红十字会等新的慈善团体结成的时候,也是沿着与旧善会完全一样的手续缔结而成的。慈善会和善会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

清末的中国,的确接受了来自欧洲、美国以及近代日本的影响,可以推测“善举”的近代化就是在这一影响下进行的。在此之后,终于有了“慈善事业”的专门词汇。新的因素否定了为善的因果报应,将教育和职业训练作为一种新兴事业。这种否定因果报应的考虑,在最早出现的善会——明末同善会上也可以看到。

以上的分析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在结社的方式上“新式”的意义究竟表现在哪里?本文一开始叙述了在近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出现了旧式社团和新式社团的概念,可是,如上所述可以搞清楚的是,从“善举”到“慈善事业”的结社方式来看,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善会善堂的传统,才能出现从未有过的、共同追求新目标的“新式社团”。

作者简介:夫马进,男,日本国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

(胡宝华译)

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

夫马进

(日本国京都大学文学部)

今天我想在这里谈谈关于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的问题。也许今天的与会者中了解这个话题的寥寥无几,所以我先对这个问题做一简单说明。

在中国的清朝时期,从朝鲜的国都汉城出发有两条与国际连接的途径。一条是连接中国北京的路线,走这条路线的使节叫“燕行使”。另外一条连接着日本的江户,往返这条路线的使节叫“通信使”。

关于朝鲜通信使的研究,目前在日本和韩国是一个极其热门的课题。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从形式上看,通信使的时代,日本和朝鲜之间处于一种对等的关系,两者是具有“外交关系”的邻国。1945年日本统治朝鲜的时代结束了,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不复存在,过去两国对等的关系得以恢复。第二,日本的江户时代是一个锁国的时代,接待来自外国数百人规模的外交使节团体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所以,日韩学者对于研究这样的历史事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与此相反的是,朝鲜燕行使的研究即使在韩国也没有受到更多的重视。这是因为截止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朝鲜一直与中国处于一种“事大”的关系,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以前,民族主义的倾向始终很强烈,因此韩国的研究者,很难从事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

而且,中国的研究者对于这个题目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我曾经对明清时期从北京去朝鲜汉城的使节所写成的旅行记与去琉球使节写下的旅行记进行了比较(见拙稿《使琉球录与使朝鲜录》,刊于夫马进编《增订使琉球录解题及研究》榕树书林,1999年)。根据这个研究可知,明清时期赴琉球的历代使节都写下了旅行记。与此相对,虽然明清时期有数百个使团从北京前往朝鲜,但是限于目前所知道的,记述赴朝鲜的旅行记不足二十篇。我想这个数字说明了明清时代中国人对朝鲜的兴趣是很淡漠的。即便是现在,像南开大学孙卫国先生那样的研究者也是屈指可数的。

但是,现在随着韩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在韩国,至少那些迄今为止阻碍研究的制约正在不断地被取消。2002年韩国出版了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汉城,东国大学出版部);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篇》(汉城,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以此为契机,可以说目前正是燕行使研究开始的时候。今天,我想在这里谈谈研究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所具有的意义。

首先,“燕行使”在资料中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应该注意的是,它是一个学术上的用语。《朝鲜王朝实录》以及《明实录》《清实录》记载的是冬至使和正朝使,或者是圣节使、谢

恩使等具有特定目的的词汇,没有专门用于这些职务的总称。而通信使则是特指以通信联络为目的专门词汇,并成为朝鲜对前往日本使节的一种总称。燕行使一词在史料中所使用的“燕行使臣”“赴京使臣”“事大使臣”等词汇中,是一个考虑现今东亚国际形势不涉及上下关系的最合适的学术用语。

接下来,举例说明研究朝鲜燕行使的意义所在。第一,这个研究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有关朝鲜与明清关系史根本的研究。关于这方面的介绍,我在这里就无需赘言了。

第二,作为明清中国国内问题的研究,燕行使写下的史料,提供了中国史料中所没有的重要资料。这里举出的一个例子是,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及时得到日本丰臣秀吉准备再次侵略朝鲜情报的朝鲜国王,为了要求明王朝派遣援军而向北京派出了使节。这位使节留下了亲笔写下的史料。这是他担心明王朝能否派遣援军,在向明朝官僚们呈上请愿书时,记录下在天安门的中门和午门前所看到的情况:

臣等进往六科衙门,衙门皆在阙内,六科给事各坐本衙。吏科门外书揭刘道享(亨)参论石尚书文,兵科门外书揭徐成楚参论石尚书文,若榜示者然。人多聚读,亦有誉书者。

初九日庚午,晴。留玉河馆。臣等早往午门外,俟都察院入朝房。臣等立于户外,使下人入送呈文,则披见还给,曰呈于诸会处。寻已科道诸官一时来到。臣等进前跪伏泣诉,科道等官曰起来。臣等不起愈叩头,使李海龙毕陈情理。科道等官曰,今日会议正为此事云。臣等起立,科道等官过向兵部朝房而去。有顷,石尚书自其朝房变服出,向阙外去。问其故,则人皆曰,科道对面切责。且曰,今日所议事也,尚书何敢得与云,故去也。九卿以下齐会于五凤楼下,左右序立将入门。臣等进前,手持呈文,叩头号泣,令李海龙毕陈悯迫之状。九卿以下互相论议,使下吏受呈文。答曰,今日会议政(正?)为此事,尔等伺候于兵部。

这里记载的是万历二十五年围绕朝鲜问题在紫禁城内所发生的真实记载。这段史料记录了在天安门内侧的朝房,当时的给事中呈上奏章,陈述了抨击提倡和平论的兵部尚书石星,以及在朝臣议论向朝鲜是否派遣援军的当天,兵部尚书石星在会议之前,不得不换装逃亡的事情。中国方面撰写当时的史料虽然有很多,但是都没有记载此事。因此,这份史料对研究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制度及政治史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史料得以保留下来的事实说明,朝鲜派遣燕行使的一个目的,是在中国收集各种情报。其中不仅有北京宫廷与官府的情报,还有当时一般民众所流传的内容等,在中国的史料中没有留下的资料,在燕行使遗留下来的记录中却可以看到(见拙稿《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载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42,2003年)。

第三,以朝鲜派遣燕行使的史料为基础,可以研究当时东亚社会的国际秩序。在朝鲜史料《清选考》记载中,自1644年清顺治帝从沈阳迁都北京开始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朝鲜一共派遣了451次燕行使。而比较通信使方面来看,向日本仅仅派遣了12次,相差极为悬殊。当时,琉球、越南、俄罗斯等中国的周边诸国都向朝鲜派遣使节,但是与朝鲜派遣的次数

比较来看,数量上的差距很明显。而且朝鲜对于明朝,也是一年派遣三回燕行使。大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期,纵观世界史全体也很难找到类似的事例。我们在观察中国明清时期从14世纪到19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的时候,是把给中国的朝贡和来自中国的册封作为一个活动中心来考虑的。中国和琉球、越南等的关系也是这样。朝鲜燕行使留下的史料内容都是很具体的,对了解朝贡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活动,都是很珍贵的史料。但是,把这些无法进行比较的朝鲜派遣使节的事例,放在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中应该如何看待,即把它看作是典型的事例,还是非典型的事例,今后还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从相同的角度来观察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可以看出临近近代的东亚各国,至少是对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当时各自所处的位置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都是可以明显看到的。今天,我在这里,想对关于中国、日本、韩国各自的学术位置这个问题,做一个稍微详细的阐述。

例如,从18世纪到19世纪,从汉城西去北京的使节和东去江户的使节,在学术方面遇到了极其相似的问题。即东西两国都出现了反朱子学的现象。当时的朝鲜学术为朱子学即宋学所统一,对于非朱子学的学术思想,以阳明学为首全部作为异端加以排斥。可是,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则与此完全不同,在中日两国流行着极其相似的学术是清朝的汉学和日本的古学。日本的古学是什么呢?也许今天与会者中很少有人了解。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朱谦之所著《日本的古学与阳明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其首次刊出是在1962年。虽然作者把全部的学术思想分置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两个极点上是有问题的,可是,在如何理解日本的古学方面是有一定作用的。日本江户时代创建古学,并给予学术界极大影响的是伊藤仁斋(1627-1705年)和荻生徂徕(1666-1728年)。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的日本古学与戴震(1723-1777年)、段玉裁(1735-1815年)的清朝汉学有极其相似的地方。

两者相似点主要有二,其一是二者均反对朱子学。其二在研究方法方面,二者都重视古代语言,通过对古代语言的综合研究来理解儒教的经典著作。日本的古学不是接受清朝考据学后出现的,儒学则是在日本经过独自的发展后产生的。

依我个人之见,朝鲜燕行使清楚地了解汉学在清朝的流行以及关于经典研究的方法论等,是在乾隆、嘉庆之际,即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时候。去年,我写了一篇介绍1827年(道光七年)燕行使中的一人,和北京的数名学者争论“汉学”是与非的文章(见拙稿《朝鲜燕行使申在植“笔谭”所见汉学与宋学论争及其周边》,载于岩井茂树编《中国近世社会的秩序形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4年)。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朝鲜知识分子了解到在清朝流行的“汉学”是反朱子学的,它的学术基础是东汉郑玄等人的训诂学。

这里,出现了一些饶有兴趣的问题。第一,从时间上看,这场发生在道光七年(1827年)的论争出现得相当晚。它距离“汉学”全盛期已经是数十年后的事情了。清朝此后进入了由康有为等人继承的公羊学时代。第二,派往日本的通信使已经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看到了在日本被称为古学的反朱子学的学问开始大流行。1748年的通信使一行在日本各地感受到这场为了保卫宋学进行的论争,最终感到在日本朱子学已经不能复兴,充满了绝望的心情。这些都是发生在前述1827年燕行使在北京参与学术争论的八十年前的事情(见拙稿《朝鲜通信使对日本古学的认识——兼及朝鲜燕行使对清朝汉学的理解》载于《思想》第981号,2006年1月)。第三,1827年北京出现的学术论争是因为曾经随同通信使去过日本的一

名朝鲜知识分子所引起的。他在此之前的1811年作为朝鲜通信使的一员去过日本,1822年又作为朝鲜燕行使的一员去了北京。他不仅亲身了解了日本反对朱子学的实际状态,也同样感受到中国所出现的相同问题。而且他还知道朱子学只在朝鲜受到尊崇。他认为这些都是自己想象中的世界文化危机的表现,于是出现了上面与清朝人争论不休的场面。

朝鲜通信使在1748年,用中国年号来说是乾隆十三年,已经捕捉到日本古学的兴盛以及朱子学逐渐失去往日地位的信息,如果从东亚各国学术位置的角度来看,应该可以看到如下的一种局面:

第一,1748年朝鲜知识分子在东亚的一角,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朱子学失去权威的事情。作为当时的朝鲜知识分子,朱子学不仅是朝鲜一国得以存在的理由,而且也是一种贯穿“世界”的普遍原理。连夷狄民族支配的清朝也可以看到康熙皇帝称颂朱子学的记载。而且要是依据1719年通信使传入的情报,当时被他们称为“绝海的蛮儿”的日本人,虽然学术水准相当低,但也在努力学习朱子学。可是到了三十年后1748年的通信使在日本所看到的却是朱子学的地位已不复存在的局面。

第二,朝鲜通信使对于日本学术界,具有非常的恐惧感和绝望感。这个现象,如果离开他们的主观意识,站在东亚学术界各地区发展阶段的高度来看的话,它意味着那里在发生着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在东亚地区的东部,如果说到学术,大概都是沿着从朝鲜流向日本的走向发展。但是,伊藤仁斋的《童子问》这部反朱子学的书籍1719年从日本传到朝鲜以后,引起了朝鲜学者的高度警惕。接下来的通信使,即1748年的通信使则是把日本作为假想的敌人而涌到那里去的。如果从一个长时期的角度来看日本与朝鲜学术关系的话,这是一个划时期的变化,它表明学术的传播方向发生了转换。其后,朝鲜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实学”的学术思想。如果观察这种实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在此之后,日本的学术给予朝鲜一定的影响,而朝鲜的学术对日本不再有任何影响。

第三,1748年的通信使及时地将以古学为中心的日本学术情报带回朝鲜国内。正如以上所述,朝鲜燕行使的派遣次数与通信使比较而言,明显地多于后者。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条干线的途径在一个时期曾经停止了它的正常的机能。通常的话,朝鲜燕行使的途径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大动脉。朝鲜依靠燕行使把各种思想、书籍或是文物从北京带到了汉城。可是,1636年,因为清军侵入朝鲜,朝鲜废止了向明朝派遣使节的活动。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后,燕行使的活动才得以复活。可是朝鲜知识分子因为清朝是出自夷狄的满族国家,所以对其很是轻蔑,并进一步对满族统治下的汉族也持同样的态度,于是,燕行使和他们的交往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主动了。尽管每年大量的人员仍往返于汉城和北京之间,并恢复了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交流途径,但是在文化方面却出现了不合常规的、交流极其贫乏的现象。这种状态,大致上说来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如果从1644年开始算起,实际经历了百年以上的时间。在此期间,虽然不乏人员频繁往来和物品大量流动,但只得到了十分有限的清朝学术情报。这是因为多数朝鲜知识分子访问北京时,除去一些个别的人外,都不愿意与清朝人进行交往。

与此相反,对于前往日本的通信使,虽然他们并不希望与日本人进行过多的交往,但是许多日本人访问了他们的宿舍,并提供给他们各种学术信息。这是因为对当时处于锁国时代的日本人来说,通信使是极为罕见的外国人。这些在通信使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